

戰後日本天皇論的起點：丸山真男 與津田左右吉的天皇戰爭責任論^{*}

安井伸介^{**}

壹、導論

貳、政體：法律責任

參、國體：思想結構性責任

肆、變質：政治責任

伍、結論

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採取君主立憲的現代國家模式，此前沒有掌握政治實權的天皇，隨之成為日本國的元首，為維持其政治權威，政府也嚴禁國民議論天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打破此禁忌，帶來天皇論的百花齊放現象，天皇的戰爭責任、天皇與近代日本的關係、天皇的本質等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議題。日本戰敗後，丸山真男與津田左右吉率先發表天皇論，但兩者的論述呈現明顯的對比：丸山不僅主張昭和天皇該退位，也認為該廢除天皇；津田則認為昭和天皇並無戰爭責任，天皇的存在也不阻礙民主的發展。兩者討論天皇戰爭責任之際，也對天皇的本質進

* 本文之研究與寫作，獲得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MOST 108-2628-H-002-006-MY3）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學術研究生涯發展計畫－桂冠型研究計畫（NTU-CDP-109L7730）之補助，作者謹致謝忱。作者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編委會提供的寶貴意見。

** 安井伸介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anjing@ntu.edu.tw

投稿日期：2020年2月12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7月3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0/第三十八卷第一期/頁1-56。

行深入的分析，形成戰後日本天皇論的雛形。本文以政體（法律責任）、國體（思想結構性責任）及變質（政治責任）為主軸，試圖分析丸山與津田的天皇戰爭責任論。透過本文的分析，期望提供理解天皇論的重要視角。

關鍵詞：昭和天皇、大日本帝國憲法、教育敕語、國體、權威

壹、導論

1945 年 8 月 15 日天皇透過廣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帶來天皇論的百花齊放現象，曾經因所謂「不敬罪」¹而不得議論的天皇，也成為批判的對象。率先展開批判的是日本共產黨員，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拒絕「轉向」而在獄中度過十八年的德田球一（1894–1953），出獄後積極展開對「天皇制」的批判。早在 1945 年 10 月刊行的《赤旗》第一號中發表〈告人民（人民に訴ふ）〉，揭示打倒「天皇制」的目標（德田球一等，1945：1），接著於 1946 年出版小冊子《打倒天皇制：人民共和政府的樹立（天皇制の打倒：人民共和政府の樹立）》，主張廢除天皇（德田球一，1946）。不過，由於共產主義者的主張基於特定的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故即便其廢除天皇論對日本社會產生極大衝擊，也未被廣泛接受。

撇開此種政治主張，就學術性質的分析而言，戰後初期天皇論的代表人物非丸山真男（1914–1996）莫屬。丸山真男尤其因 1946 年 5 月發表的〈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丸山真男，1995b）徹底批判天皇的政治原理，迅速成為學術界及論壇的知名人物，迄今被視為天皇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們不可忽略的是，丸山在《世界》五月號發表此篇論文的前一期四月號中，津田左右吉（1873–1961）就發表〈建國的緣由與萬世一系

1. 日本刑法第 73 條到第 76 條規定對皇室不敬的罪責，其中第 74 條規定：「對天皇、天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或皇太孫有不敬行為者，處八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思想（建国の事情と万世一系の思想）》，²認為1930年代以後日本走向軍國主義是軍方的過錯，因而維護天皇（津田左右吉，1963）。曾經在所謂「津田事件」中遭受政治迫害的津田發表維護天皇的言論令不少人產生意外之感，但津田尊敬天皇的心態始終如一，此後也積極發表天皇論，形成了戰後日本天皇論的另一類雛形。值得一提的是，津田在此篇論文中使用「象徵」一詞形容皇室存在的意義（津田左右吉，1963：471）。其實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之間，為了研究如何才能維持天皇，日本外務省暗中依賴相關學者，以非公開的方式編輯發行名為《天皇制研究》的小冊子，而受委託的學者當中即列有津田的名字（三宅喜二郎，2001：93；河西秀哉，2010：18－20）。這就意味著，津田的象徵天皇論有可能影響到現行憲法的象徵概念（大井健輔，2015：308）。

丸山與津田私底下也有過一些交流，此緣分主要是因為1939年津田受邀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開設「東洋政治思想史講座」之際的首位講師，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邀請津田的是丸山的老師南原繁（1889－1974），依南原的指示，當時擔任助手的丸山每週出席旁聽，做筆記。最後一堂課結束之後，有位學生發問：津田否定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的關聯，主張「東洋文化」不存在，這不就是否定日本正在邁向建設的東亞新秩序之意義嗎？丸山瞬間察覺這位學生的提問不對勁，帶領津田離開教室到隔壁的休息室，但十幾位學生衝進休息室繼續逼問。不過，相較於丸山對學生相當激動的態度，津田反而冷靜地耐心回答。過了幾個小時之後，丸山再度帶領津田

2. 後來改名為〈日本國家形成的過程以及有關皇室恆久性的思想由來（日本の国家形成の過程と皇室の恒久性に関する思想の由來）〉。津田時常修改既有文章的篇名與內容，以下引用的文獻皆依據《津田左右全集》，篇名有所變動時，於註解處說明。

離開休息室，一起享用晚餐。此時，津田講了一句：「那些傢伙橫行於世的話，日本的皇室就有危險」。這些抗議學生是當時著名的右派人士蓑田胸喜（1894–1946）的組織「原理日本社」底下學生團體「學生協會」的學生，此件事之後原理日本社展開對津田的批判，最後發展為津田事件，丸山對此事一直感到愧疚（丸山真男，1996a）。

丸山與津田都對當時猖狂的天皇主義者感到反感，但兩者對戰後天皇存廢的主張呈現對比：丸山不僅認為昭和天皇該退位，連天皇本身都要廢除；津田則認為昭和天皇並無戰爭責任，天皇的存在也沒有任何問題。日本學術界兩位泰斗的天皇論為何如此不同？兩者對天皇的認知有何異同？戰後日本的天皇論不勝枚舉，為了深入了解天皇對日本政治社會的意義，除了分析天皇本身的歷史與其政治內涵之外，也有必要探討戰後日本學者的天皇論，而丸山與津田的討論便能為我們提供審視戰後天皇論的座標軸。鑒於此，本文試圖分析丸山與津田的天皇戰爭責任論。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兩者的討論焦點在於天皇的戰爭責任，故本文聚焦於戰爭責任論上。但是，透過他們的戰爭責任論，我們也能窺視他們如何看待天皇的本質，故同時能將之視為天皇論的展現。亦即：我們可將丸山與津田的天皇戰爭責任論視為戰後日本天皇論的起點。本文的主旨在於釐清戰後日本天皇論的起點，以此提供理解戰後日本出現的各種天皇論之基本視角。

那麼，本文為何選擇丸山和津田此兩位學者？實際上，戰後初期也有出現其他有關天皇的討論，其中較為著名的是和辻哲郎（1889–1960）與佐佐木惣一（1878–1965）之間圍繞國體概念的論爭。正如赤坂憲雄在《「象徵天皇」的故事（象徵天皇という物語）》中將津田與和辻視為建構「象徵天皇」的主要學者（赤坂憲雄，

2019），和辻於戰後初期提出的天皇論也有其重要意義。不過，和辻的主要論點在於，將「國民」定義為「文化共同體」，不一定跟「國家」重疊（和辻哲郎，1962a：337），而將天皇的本質視為文化意義上的「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和辻哲郎，1962b：367）。也就是，和辻的天皇論試圖切割天皇與政治的關聯，由此為戰後日本的象徵天皇論提供一種解釋方式。相形之下，雖然津田也重視天皇的象徵意義，但是他依然重視天皇作為政治統治者的權威（津田左右吉，1963：462），因此，我們能藉津田的論述探析政治意義上的天皇論。也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將津田與丸山當作比較分析的對象。

實際上，丸山與津田時常被當作一組比較的對象。例如，奧武則在《論壇的戰後史（論壇の戦後史）》的第三章以〈天皇・天皇制——津田左右吉與丸山真男〉為標題，介紹《世界》雜誌刊登丸山與津田論文的情況（奧武則，2018）；萩原隆於〈在日本傳統國族主義可能嗎？——丸山真男與津田左右吉——（日本における伝統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は可能か——丸山真男と津田左右吉——）〉中，藉由丸山與津田的討論，探討日本建構傳統國族主義的可能性（萩原隆，2014a；2014b）。只是，前者將論壇雜誌的歷史當作敘述主軸，故並沒有深論丸山和津田的思想；後者的主旨在於藉由丸山和津田的討論，展開作者試圖建構日本國族主義的主張，故也不是深入比較兩者思想的論文。

相較於此，赤坂的《「象徵天皇」的故事》雖然主要分析津田的象徵天皇論，但也有論及丸山真男，其視角與本文之間有相似之處。赤坂分析津田天皇論的目的在於批判津田對於天皇的理解，因為赤坂認為為了理解天皇，必須整體性地掌握「權力與權威的雙重王權」以及「天皇的宗教性」的兩面（赤坂憲雄，2019：202 - 204），

但是津田將天皇的本質定義為政治上的「精神權威」，故對赤坂而言，津田忽略了作為宗教的天皇制（赤坂憲雄，2019：28）。而赤坂在此批判脈絡上簡單論及丸山，指出：雖然津田與丸山的討論目的不同，但是兩者都將「精神權威」視為天皇的核心，在此可見兩者之間「奇妙的一致」（赤坂憲雄，2019：33），他進而批判丸山的天皇論也呈現無法掌握天皇宗教性的近代合理主義思考之限制（赤坂憲雄，2019：35）。赤坂在津田與丸山天皇論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宗教性是天皇論中不可忽略的因素，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後續出現的天皇論之一種類型。諸如此類，戰後日本出現的天皇論往往將丸山與津田的天皇論當作基本前提，但未必在其論著中全面論述他們的天皇論。因此，我們徹底釐清丸山與津田天皇論的整體面貌，才能深入理解戰後日本為數可觀的天皇論。

前述兩篇丸山與津田的著作是他們天皇論的代表著作，但實際上他們在其他文章中亦論及天皇，故為了統籌並深入理解他們的天皇論，我們需要設定一套分析架構。有鑒於此，本文將以下三種概念當作分析主軸：政體、國體以及變質，分別討論丸山與津田如何看待大日本帝國憲法與天皇法律責任的關係、教育敕語呈現的天皇思想結構性責任以及十五年戰爭時期的天皇政治責任。³

3. 鶴見俊輔於1956年首次使用指涉從1931年的滿洲事變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十五年戰爭」一詞（江口圭一，1991：11），而在江口圭一於1986年出版《十五年戰爭小史》之後廣為流傳（安井三吉，2016：84）。「十五年戰爭」一詞有一些爭議，例如：可否將不同戰爭一律概括為統一戰爭的概念、此十五年並非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實際上只有十四年等。但是，本文依然使用「十五年戰爭」一詞，是因為主要想藉此指涉近代日本變質的時期。此點在第四節詳論。另外，關於鶴見對此時期的看法，可參考他在加拿大上課的記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2008）。鶴見提倡「十五年戰爭」一詞的主要原因在於，若將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戰爭和對美國的戰爭加以切割，日本人傾向只認為敗給美國，對於亞洲的責任感變

在此可能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國體」與「政體」的區分，因為「國體」概念具有爭議性，⁴ 如和辻與佐佐木的論辯，一直成為爭論的對象。佐佐木於 1946 年年底發表〈國體變更（国体は変更する）〉一文，認為「國體」概念指涉兩種意涵，一種是政治樣態面向，另一種是精神觀念的面向（佐佐木惣一，1949：23 - 24），而身為法律學者，他依據前一種意涵將國體概念定義為統治權的總攬者。就此意義而言，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天皇總攬統治權（第 4 條），但日本國憲法規定主權在國民（第 1 條），故佐佐木認為發布日本國憲法，便意味著國體變更（佐佐木惣一，1949：26 - 28）。對此，和辻提出不同的觀點。和辻認為「誰是統治權的總攬者」是政體概念的範圍，並非國體的問題（和辻哲郎，1962b：358）。和辻不太認同使用「國體」此一本身即具有爭議性的概念，但更無法認同以國體概念指涉統治權的總攬者，故主張以「政體」一詞指涉包含統治權總攬者的制度面向即可。此後，佐佐木撰寫長篇的回應文章，和辻對此再度提出自己的見解，佐佐木亦再次發表回應。⁵

透過他們的論辯，我們可理解「國體」概念的複雜性，但如佐佐木所界定，其主要意涵可分為「政治樣態面向（法律概念）」和「精神觀念的面向（思想文化概念）」，而使用哪一種意涵的國體

得極為薄弱，故鶴見試圖將兩者放在同樣的脈絡中理解。實際上，十五年戰爭的開端是軍方的暴走，政府原先對此不樂見，但政府後來利用亞洲主義的論述將對亞洲的軍事行動合理化，進而提倡「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就此意義上，在軍方的主導之下，政府對亞洲的態度也有所轉變，這也象徵著此時期的「變質」。

4. 在政治學領域的中文習慣用法中，「國體」往往被當作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所說的 form of state 之翻譯詞，相對於 form of government 的「政體」。本文所指「具有爭議性」，是依據日文的習慣用法而言。
5. 這些文章與前述文章同樣收入在佐佐木著《天皇の國家的象徵性》與和辻著《和辻哲郎全集》第十四卷中。

概念，取決於討論目的：佐佐木討論國體概念的法律解釋，故採用前者的定義；為了強調天皇在統合國民的象徵性意義，和辻主張以政體概念指涉前者，而雖然和辻反對使用國體一詞，但實際上他的主張接近後者的定義。作為學術論文，本文認同佐佐木的態度，即承認國體概念的多樣性，而基於討論目的暫且限定國體概念的範圍。本文的目的在於分析丸山與津田的天皇戰爭責任論，丸山的討論主要針對國體的「精神觀念的面向」；津田雖然否定丸山的主張，但他也主張天皇的權威作用。因此，本文如此區分國體和政體：以「國體」一詞指涉以天皇為核心的特殊國家型態呈現的精神觀念，將教育敕語視為其具體呈現；而如和辻所主張，以「政體」指涉所有制度面向，包括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法律解釋。⁶

本文之所以採取上述之概念界定，是因為如此便能明確區分丸山和津田天皇責任論的論點：政體意味著大日本帝國憲法如何規範天皇的責任歸屬，此涉及天皇的法律責任；國體意味著以天皇為核心的觀念如何規範近代日本的精神結構，此涉及思想結構性責任；而政體與國體被軍方濫用的就是十五年戰爭時期，在此稱之為變質時期，此時期天皇的所作所為決定天皇的政治責任。透過這些分析，我們可理解圍繞天皇戰爭責任的重要論點，以及戰後日本天皇論的雛形。

進入具體的討論之前，在此事先想要釐清「天皇制」的詞義。正如津田認為「天皇制」一詞含有共產黨企圖打倒天皇的意向（津田左右吉，1965d：243），其用例可追溯到1931年「日本共產黨政

6.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大日本帝國憲法與國體概念無關，即便大日本帝國憲法沒有出現國體一詞，其內容也深深反映著國體的精神觀念。為分析上的方便，在此暫且如此區分。

治綱領草案」，明確記載「打倒天皇制」的口號（藤岡淳吉編，1951：46）。⁷ 至今有些日本保守主義者因而拒絕使用「天皇制」一詞，但基本上「天皇制」已經失去共產黨試圖廢除天皇的意味，大部分用來純粹指涉以天皇為核心的日本政治制度。然而，從政治制度論的角度看待，所謂「天皇制」無疑是一種君主制，大日本帝國憲法訂定的也是君主立憲制，即便現行憲法之下的天皇沒有實權，亦可視為君主立憲架構下的「象徵君主制」（下條芳明，2005：iv）。⁸ 實際上，除了共產主義者之外，戰前日本也沒有使用「天皇制」一詞，丸山就讀第一高等學校時遭受過特別高等警察（簡稱「特高」）的審訊，審訊人查看丸山的筆記而誤以為丸山跟共產主義者一樣否定天皇，當時審訊人就說：「你否認君主制，對吧！」（丸山真男，1996b，21）。由此可見，就政治制度的原理上，我們從君主制的角度理解天皇即可，沒必要另外特別使用「天皇制」一詞。不過，既然「天皇制」一詞現今已廣為流行，鑒於此現象，我們能否進一步追問：假如天皇存在著其有別於一般君主制的特殊性，其特徵是什麼？透過丸山與津田的討論，我們或許能窺見其一端。

7. 1931 年之前，日本共產黨已有 1922 年的「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1927 年的「關於日本問題的決議」等綱領。這兩篇文章由第三國際以俄文起草，再提供英文及德文版，而日本共產黨員再依此翻譯為日文。由於原始的日文版已遺失，目前只能參考後人的翻譯。在有些戰後出版並收入此兩篇綱領的資料集中，也有使用「天皇制」一詞的文句，但這應該是以後人的習慣用詞「天皇制」翻譯歷史資料的結果。至於 1931 年的「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日本共產黨員依照第三國際指示，以日文起草，故可確定當時有意使用「天皇制」一詞（犬丸義一，1987：257）。著名的勞動運動家山邊健太郎也說：「將日本的君主制以『天皇制』一詞描述的是 1931 年政治綱領草案以後，之前都說廢止『君主制』」（石堂清倫、山邊健太郎編，1961：246）。

8. 下條在「絕對君主制」、「立憲君主制」、「議會主義君主制」的發展脈絡中，將「象徵君主制」視為下一個君主制的階段，進而比較日本與瑞典的象徵君主制。

貳、政體：法律責任

一、津田左右吉

如果我們討論天皇的戰爭責任，依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規範在法理上確定責任歸屬，是不可或缺的探究方法。在此問題上，我們先分析津田的觀點。一開始，津田認為天皇法制上也沒有責任。於 1946 年 4 月發表〈建國的緣由與萬世一系的思想〉之後，津田翌月馬上接著發表另外一篇討論到天皇的論文〈關於日本文化的現狀（日本の文化の現狀について）〉，⁹ 文中簡單論及大日本帝國憲法。津田認為，廢除天皇的主張之所以出現，應該是因為倡導者認為此次戰爭的責任在天皇，而其主張的根據之一是，此次戰爭的開端是天皇的宣戰詔敕。對於此種講法，津田就說：「以詔敕的方式宣戰，是因為憲法規定它屬於天皇大權，亦即不需經過議會的同意，政府就能決定事項，所以採取這樣的形式而已，而宣戰本身是政府所決定，是政府應該負責的」（津田左右吉，1966：141－142）。一般而言，大權意味著大日本帝國憲法從第 5 條到 16 條所列的天皇親自行使的權力，例如：「天皇以帝國議會之同意，行使立法權」（第 5 條）、¹⁰ 「天皇統帥陸海軍」（第 11 條）、「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軍之兵額」（第 12 條）、「天皇宣戰、講和及締結各項條約」（第 13 條）等。在津田看來，天皇宣戰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責任需要區分形式與實質，即使形式上天皇掌握大權，實際上卻是

9. 後來改名為〈日本人知性的作用（ニホン人の知性のはたらき）〉。

10. 以下大日本帝國憲法以及憲法義解的中文翻譯取自（伊藤博文，2011）。

由政府決策，天皇也沒有實質參與決策過程，就此意義上天皇沒有責任。津田的討論著重實際決策過程，天皇沒有決策而無責任。若是如此，是否尚有保留大日本帝國憲法「形式上」將責任歸於天皇的可能性？在同一篇文章中津田說：「只要是法制上的問題，天皇沒有政治上的責任，這是憲法所明示的」（津田左右吉，1966：143），在此津田將「法制上」的責任與「政治上」的責任等量齊觀，並沒有嚴格區分，但就其討論內容而言，文中沒有論及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法理問題，故他的意思應該是天皇沒有「政治責任」。然而，我們在此節關心的問題的重點在於：天皇若依憲法規定之大權宣戰，如此在「法制上」天皇能否迴避責任？

或許津田也察覺到需要區分法律責任與政治責任，故後來進一步討論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條文與法理問題，而說：「憲法的規定本身具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天皇與執行天皇之權的政府之間的關係不明瞭……而歸根究柢，這就意味著政治責任歸於天皇。可以說，由於加強天皇之權，憲法自然將責任歸於天皇」（津田左右吉，1965b：348－349）。津田在此討論的是憲法條文上的責任歸屬，故他所說的「政治責任」應理解為「法律責任」。津田依然認為天皇實際上沒有行使權力故沒有責任，但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理解上，津田現已明白認定法理上可解釋為天皇有責任。此後，津田進一步探討大日本帝國憲法，於1959年發表〈明治憲法的成立（明治憲法の成立まで）〉，探究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思想由來與擬定過程。此文篇幅長，但其中可窺見津田的問題意識在於探討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缺陷，例如在思想上，津田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

繼承王政復古時的理念「天皇親政」，¹¹ 此思想將憲法導向加強君權的方向（津田左右吉，1964b：397）。天皇親政思想將政治權力集中在天皇手中，但津田認為天皇與政府的角色應該是分開的，故批評憲法的起草者說：「制定憲法的時候就是區分天皇即宮廷與政府而釐清其分界的最佳機會，但錯過其機會，就是起草者伊藤等人最大的過失」（津田左右吉，1964b：409）。

除此之外，津田也具體指出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缺陷。一般而言，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條文中，規定天皇不負責任的是第 3 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以伊藤博文（1841–1909）的名義於 1889 年出版的《憲法義解》寫到：「法律非但無責問君主之權力，對天皇亦不可懷不敬之意，冒犯身體，甚或指責非難，議論評價之行徑必不允許」（伊藤博文，2019：25）。雖然伊藤強調條文之內涵在於「不可懷不敬之意」與天皇具備之神聖性，但法律上其主要用意在於法律無法責問君主，亦即，天皇不會有法律上的責任問題。天皇對於國家的政治行為不負責任的話，誰該負責？第 55 條規定：「國務大臣負有輔弼天皇之責任。所有法律、敕令及有關國務之敕詔，須有國務大臣之副署名」，由此可見，大日本帝國憲法對於責任問題的規範相當明確：天皇不負責任，國務大臣負責任。這就成為天皇沒有責任的法律依據。

11. 據石井良助的說法，「天皇親政」是在近代日本不容挑戰的禁忌，但戰後可自由發表見解了，故他於 1948 年出版的《日本法制史概要》中展開「天皇不親政」的主張（石井良助，1982：i）。赤坂認為石井的天皇不親政論將津田與和辻的天皇形象進一步具體化，同樣構成象徵天皇論（赤坂憲雄，2019：79）。實際上，津田於〈建國的緣由與萬世一系的思想〉中已指出明治維新是將以往的雙重政體改為天皇親政的制度改革（津田左右吉，1963：466），而坂田吉雄（1984）則進一步分析明治時期天皇親政具體內容的演變。由此亦可見津田為後續的天皇論提供重要論點的一面。

然而，津田指出這些條文法理上的問題。第 55 條規定：「國務大臣負有輔弼天皇之責任」，這意味著大臣「對天皇」負責，並非「對國民或議會」負責。那麼，誰對國民或議會負責？津田認為，法理上只能推論天皇最終依然需要對國民或議會負責。因此，津田批判大日本帝國憲法沒有明定大臣對國民或議會的責任（津田左右吉，1964b：400 - 401）。此爭議主要出現在統帥權問題上：統帥權是天皇大權的其中一個，也被視為軍方不受政府控制的關鍵，丸山也認為統帥大權成為軍方干涉政治與政策決定權的踏板（丸山真男，1996b：27）。在統帥權的解釋上，津田也批判《憲法義解》，該書寫到：「本條規定兵馬之統一大權歸屬至尊，專指帷幄大令之歸屬者也」（伊藤博文，2019：42），此說法令人以為「帷幄之大令」存在於政府之外，故軍方利用此條的解釋不聽從政府而能隨心所欲。假設統帥權的責任不在於政府，這就等於天皇有責任，津田認為《憲法義解》寫的這一句實在輕率，進而將起草《憲法義解》的井上毅（1844-1895）批判為對於自由民權極端反動的思想家，也是天皇絕對主義的鼓吹者（津田左右吉，1964b：410）。值得一提的是，津田指出於自由民權運動時期在民間出現將英國政體視為君主立憲國模範的見解，他認為這是因為如此就能避免將責任歸於天皇，進而甚至講到：如果日本模仿英國政治的習慣，便沒有發生這種爭議（津田左右吉，1964b：392、411）。

由此可見，津田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吸收絕對君主的思想要素，這就導致憲法規範與現實運作的乖離，此乃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缺點。雖然如此，津田認為，1930 年代因軍方的暴走而進入特殊時期之前，大日本帝國憲法之下的日本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是因為天皇並沒有依照憲法規定動用大權。換言之，國政運作的方式「違

背」憲法規定，才使日本的政局健全（津田左右吉，1964b：404、409），這就意味著近代日本健全的運作是天皇自我約束的結果。如此一來，津田有關天皇責任的觀點可理解為：憲法規範上有法律責任，但實際運作上沒有政治責任，而津田依後者歸結出天皇沒有戰爭責任之結論。

二、丸山真男

相形之下，丸山並沒有特別重視大日本帝國憲法，丸山天皇論的代表作〈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亦沒有討論到大日本帝國憲法，只指出「天皇機制（非制度）」難以產生獨裁的觀念（丸山真男，1995b：31）。丸山天皇論的主要特色在於對天皇機制的分析，故制度並非丸山主要關心的對象。雖然如此，丸山在別的文章中曾論及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相關問題，我們可藉此理解丸山的觀點。

丸山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基本觀點由以下文句可以理解：「說到大日本帝國憲法，現在的人們通常會有一種印象，即：它與教育敕語共同構成戰前天皇制意識型態的核心。但是，這種理解只正確一半。兩者當中，成為戰前天皇制思想支柱的是教育敕語，並非憲法」（丸山真男，1996b：25），可見丸山並不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是導致戰前日本超國家主義的主要因素。丸山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這種理解或許來自以美濃部達吉（1873–1948）為首的憲法學者之影響。東京大學法學部設有專門研究憲法的「憲法學講座」，原本由美濃部擔綱講授「憲法」課程，1933年美濃部退休後，改由美濃部的弟子宮澤俊義（1899–1976）接任。丸山於1934年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之際，剛好上到宮澤首次開授的「憲法」課程。宮澤對憲法條文的解釋使丸山對法律的負面形象完全改觀，例如宮澤將第3條

「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只解釋為天皇不成為刑事追訴的對象，法律上沒有其他任何意思（丸山真男，1996b：24－25）。法理上這樣解釋第三條並非特殊的解釋，但此條往往被理解為強調天皇之神聖性，給予天皇有別於一般人的宗教形象。丸山似乎原先也持有這樣的理解，故接觸憲法課的法理解釋後，對法律的意義改觀。

丸山也回憶具有「憲政之神」稱號的尾崎行雄（1858–1954）之演講，尾崎講到：即便是天皇，不經過法律同意，也無法碰觸我們的私有財產，這就是帝國憲法的精神。此解釋也使丸山如撥雲見日。站在這種憲法解釋的立場，理所當然將引導出日本走向戰爭並非憲法條文，而是運用上的問題之結論。實際上日本戰敗後美濃部也反對制定新憲法，他主張只要正確運用既有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即可。因此，丸山強調，日本走向戰爭的理由並非「因為憲法」，而該理解為「即便有明治憲法的規定」也走向了戰爭，我們不可忘記此一面相（丸山真男，1996b：26－28）。丸山坦承：「肯定立憲主義式天皇制的立場在大學時代依然持續，對昭和天皇的印象也並非不好的」（丸山真男，1996b：29）。由此可見，丸山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理解深受美濃部立憲主義派的影響，故不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使日本走向戰爭的主要原因。

不過，這當然不意味著丸山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完全沒有問題，實際上丸山也指出：「如終戰時天皇的『聖斷』所示，日本戰前的政治結構本來就規定天皇最終能夠統合並決定國家意志」，大日本帝國憲法依然具有君主制的一面。丸山進而指出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第一個缺點是：同時具備立憲君主的一面與絕對君主的一面，這就導致身為主權總攬者的天皇之責任非常曖昧（丸山真男，1996d：327）。大日本帝國憲法具有此種雙重性質，是因為擬定憲

法的過程中統合不同立場的意見之結果。簡言之，伊藤博文、井上毅、伊東巳代治（1857–1934）、金子堅太郎（1853–1942）等人參與起草，政府法律顧問 Hermann Roesler（1834–1894）也提供相當多建議，故坂本一登在《憲法義解》的「解說」中說：「歸根究底，憲法典是具有不同憲法觀的憲法起草者之間以及憲法起草者與政府相關人員機關之間最大限度妥協的產物，本具多義性」（伊藤博文，2019：270）。因而憲法可解釋為立憲主義，亦可解釋為君主具有相當大的決定實權，這是丸山指出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第一個缺點。

丸山所認為的第二個缺點是統治機構非常多元，因而使責任意識曖昧化。例如，國務大臣兼行政大臣，且採取單獨輔弼制，故行政的派系主義直接反映在內閣之中；統帥與國務分開，直到天皇的層次才能統合；內大臣府、樞密院、元老、重臣會議等權限曖昧的團體向內閣施壓，等。這些設計進而導致右派人士等可透過非正式管道影響政策，這是大日本帝國憲法之下的統治機構特徵所致。這種統治機構的多元性也使日本政局不穩定，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換過 15 次內閣，因而無法確定如納粹般推動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明確政治主體，這是在其他極權國家看不到的特色（丸山真男，1996d：327 – 329）。

由以上兩點的討論可知，丸山極為在意的是責任歸屬的問題，而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規定恰恰使責任歸屬曖昧化，這是丸山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評價。只是，主張天皇戰爭責任的丸山並非將主要原因歸咎於大日本帝國憲法，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值得一提的是，丸山明白指出昭和天皇戰爭責任時如此說過：「先不管大日本帝國有關天皇地位的繁雜法理問題，身為主權者『總攬統治權』，具有自由任免國務大臣的權限，並直接掌握統帥權等大權，實際上自行

決定終戰，使得幾百萬的軍隊在幾乎沒有摩擦的情況下解除武裝，這樣在國民之間具有強大權威的天皇，對那十幾年的政治過程與其結果沒有責任？政治倫理上的常識不允許這種說法」（丸山真男，1995c：162 - 163）。此說法似乎對天皇有無法律責任的問題依然有所保留，無明確結論，但丸山深信昭和天皇具有政治責任，故必須繼續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此件事與天皇制的問題可以分開進行（丸山真男，1995c：163）。或許我們也可以說憲法所規範的法律責任不成重要問題，是因為戰爭責任所涉及的對象是憲法規範之外的他國。丸山也指出，責任的討論必須釐清是對誰的責任，對本國國民的責任與對他國國民的責任不得混淆（丸山真男，1996d：324）。丸山明確意識到對國內與國外有不同的責任問題，但也沒有進而探討國際法上的戰爭責任。可見，對丸山來說，法律責任並不是他主要關心的問題。

在政體的討論上，津田明確主張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缺陷在於，其法理結構最終將責任歸屬於天皇。由此推論，雖然沒有明講，但他似乎承認天皇負起法律責任的可能性。只是，津田堅持主張天皇沒有實際參與決策過程，在法律的運作上，天皇沒有政治責任；丸山也同意大日本帝國憲法有絕對君主的一面，至於有無法律責任，由於法理規範相當曖昧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具有多種解釋的空間，故丸山似乎無意探索明確的答案。雖然如此，丸山堅持主張天皇具有政治責任。如此看來，對於政體的理解並非導致兩者天皇論差異的關鍵，實際上兩者在批判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同時，也有肯定其立憲主義的一面，津田說過：「如國民權利義務的規定，並不遜色於其他任何國家的憲法」（津田左右吉，1964b：409）。如此一來，兩者的天皇論從制度問題進入到思想文化的層次，下一節的主題「國

體」即是其象徵性概念。

參、國體：思想結構性責任

如丸山所說，現代日本人反思近代日本之際，往往並列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教育敕語，視為近代日本走向破滅的根源。但實際上兩者的性質並不相同，憲法是現代國家的根本法條，其中包含制度安排，如如何規範天皇的權力與責任；相較於此，教育敕語的性質相當曖昧。教育敕語於公佈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隔年（1890 年 10 月 30 日），以天皇睦仁的名義，在宮廷內遞交給內閣總理大臣與文部大臣的方式公布。「敕語」並非「敕令」，¹² 教育敕語跟政府體系的法律不同，亦即不具強制力。但是，教育敕語上有「天皇御璽」之蓋章，如此教育敕語即具備官方文件之性質，此點與法律極為相似。這種性質的教育敕語為何被視為問題的根源？本節先探討相當重視教育敕語負面影響的丸山真男之討論。

一、丸山真男

如前文所述，丸山並非將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缺陷視為戰前日本的核心問題，依他的理解，大日本帝國也並非天皇獨裁。在他看來，教育敕語以及其所象徵的思想結構是最大的問題，簡言之，教育敕語是「戰前天皇制的思想支柱」（丸山真男，1996b：25）。丸山的成名作〈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也將教育敕語所呈現的論理當

12. 大日本帝國憲法第 8 條規定：「天皇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災厄，依緊急之需要，於帝國議會閉會期間，可發布代替法律之敕令」。

作核心論點。在此篇論文中，丸山批判教育敕語說：「召開第一屆帝國議會前夕發布教育敕語，就意味著日本國公然宣布，作為倫理實體，國家壟斷並決定其價值內容」（丸山真男，1995b：15）。為何並非法律的教育敕語能夠產生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教育敕語的全文並不長，總共只有三百多字，其內容主要可從兩個面向理解：第一個面向是，對國民要求遵守倫理道德，如：「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等，¹³ 雖然這種德目本身不一定具有爭議性，但在此可見國家介入國民倫理道德問題的意圖；另外一個面向是，這些德目的最終目的連接到天皇，如：「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可解釋為日本國民道德生活的一切都是為了天皇，此乃「國體之精華」（「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教育敕語的內容遭受後人批判的重點主要在於第二個面向。

教育敕語中出現「國體」概念，從此國體就成為理解近代日本的關鍵概念。近代意義的國體概念自江戶中期開始出現，但當時只意味著國家的體面、國家特色等意思，不一定跟天皇結合在一起。直到江戶末年，水戶學對近代國體概念的形成扮演重要角色。面對西方列強的出現，會澤正志齋（1782–1863）撰寫《新論》，使用國體概念主張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此後國體概念逐漸帶有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日本的意味，進而在教育敕語中出現「國體之精華」一句。於 1925 年施行的「治安維持法」中，首次出現作為法律用語的國體概念：「以變革國體或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為目的組織團體者或知情之下加入其團體者處有期徒刑十年以下或禁錮」（第 1 條）。就丸山的回憶，宮澤將國體解釋為憲法第 1 條「大日本帝國，由萬

13. 教育敕語的中文翻譯依據《漢英佛獨教育敕語譯纂》（文部省，1909）。

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和第 4 條「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條規行使之」，違反此兩條等於否認國體（丸山真男，1996b：25）。從此以後，有無否認國體就成為右派人士攻擊知識分子的焦點，因此國體概念如今帶有某種負面形象。

教育敕語的內容本身有爭議性，但問題在於，並非法律的教育敕語如何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力？在此我們可見國家權力與教育的結合，亦即：教育敕語透過國家權力滲透到民心。發布教育敕語的隔天，文部省在訓令中寫到：「製作教育敕語的謄本，將之廣泛頒布到全國之學校」，同年又制定「小學校祝日大祭日儀式規程」，規定校長或教職員必須奉讀教育敕語。透過這些儀式，教育敕語普及到民間，甚至在修身課程中督促學生背誦，進而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對於丸山來說，國家權力灌輸倫理是極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對他而言，價值的中立性是現代國家的重要原則（丸山真男，1995b：19）。即便是主張絕對主義的霍布斯（1588–1679），此絕對性並不意味著政治權威含有倫理價值，而「依主權者的決斷，是非善惡才能定下來，而並非主權者實現事先內在的真理以及正義，這就是利維坦的國家」（丸山真男，1995b：24）。在歐洲絕對主義到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倫理道德的絕對標準並非內在於國家，因此能產生國民的自主判斷與由此而來的責任感。相較於此，近代日本的國家主權不僅握有政治權力，也壟斷精神權威，國家本身含有其政治行動的正當性基準，這就表示國家不服從於超越國家的道義標準（丸山真男，1995b：24）。教育敕語將倫理道德的項目連接到天皇，並將一切為天皇奉公盡忠的機制稱為「國體之精華」，丸山因此將國體的特色分析為以天皇為核心而含有絕對價值的體系，這就是丸山天皇論的重點。

這樣的國體體系導致三個主要的問題：首先，如果日本帝國自己體現倫理，這就意味著本質上日本帝國不會行惡，進而任何暴虐都做得出來（丸山真男，1995b：25）；其次，以天皇為核心的價值結構中，與天皇的距離決定社會上的地位，因而產生「壓迫的移讓」現象，在國際關係上，將此移讓原理擴大到其他國家身上（丸山真男，1995b：25、32-33）；最後，在國家主權為倫理的終極來源之結構中，每個人無法在心中建立倫理的內在化，因而無法產生責任感（丸山真男，1995b：25、31）。丸山透過這些論述試圖指出天皇機制導致侵略戰爭的「論理」，以及欺壓他者（心目中的下位者）但對其自身的行為缺乏責任感的「心理」。丸山最後將此結構與機制描述為：「縱軸（時間性）的延長即圓（空間性）的擴大」（丸山真男，1995b：36），在此空間性的擴大意味著對外侵略（壓迫的移讓），但何謂時間性的延長？雖然丸山沒有在此論文中深論，但實際上這就是天皇與其他一般君主不同的特色，亦即：萬世一系的天皇具備時間上的永久性。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條是「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教育敕語開頭也寫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臣民修身的目的最後連接到：「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可見天皇的永久性是貫穿日本政體與國體的核心概念。在此篇論文中，丸山並非指出昭和天皇個人的戰爭責任，也不是如共產主義者般，依據意識型態提出廢除天皇的主張，而是從政治思想研究的角度深入分析表面上難以窺見的天皇（國體）結構與機制，以及其機制導致問題的論理與心理。無論同意與否，其研究方法與論述方式，對於日後天皇研究提供相當重要的討論基礎。

二、津田左右吉

丸山對於教育敕語以及它所呈現的天皇機制提出強烈的批評。相形之下，津田並沒有透過分析教育敕語進一步展開深入的論述，但依然認為教育敕語含有嚴重的問題。津田於 1946 年 7 月發表〈日本人對生活的反省（ニホン人の生活の反省）〉，在後半段專門討論教育敕語。¹⁴ 津田在文中指出教育敕語的幾個問題，首先，教育敕語中可見許多有關倫理道德的概念，津田認為這些觀念來自儒家思想，而歷來對儒家思想持有批判態度的津田，因而認為這就是教育敕語的缺點之一。他也認為，不僅是倫理項目本身，以敕語的形式揭示國民道德的基準，此方式本身就來自帝王教化民眾的儒家思想。並且，教育敕語將其道德規範當作「皇族皇宗之遺訓」，採取先王教導人道的形式又是儒家思想的影響，實際上歷史之中並無此事實（津田左右吉，1965e：234－235）。在津田看來，天皇與日本國民的關係並非外在的對立關係，而是「如內在存在」（津田左右吉，1965e：232），不應該從君臣關係的角度規範天皇與國民的關係。

從教育敕語成立的過程來看，津田的指點並非無憑無據。在教育敕語的擬定過程中，與大日本帝國憲法相同，可見不同立場知識分子的意圖混雜在其中。為了理解擬定教育敕語的意圖，我們需要回到「教學聖旨」的爭論。教學聖旨是 1879 年天皇遞交給伊藤博文等人的教育方針。文中強調，維新以來雖然吸收西學的知識而有所發展，但過於偏重知識而忽略仁義忠孝的倫理教育，進而導致風俗

14. 後來將後半部分獨立出來，改名為〈關於教育敕語（教育に関する勅語について）〉，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一卷》（津田左右吉，1965e）。前半部分以原篇名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三卷》（津田左右吉，1965a）。

敗壞。聖旨因而強調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追求道德與才藝兩方面的教育。雖然此聖旨以天皇名義撰寫，但實際上在背後推動的是當時擔任宮內省侍補的元田永孚（1818–1891），元田具有濃厚的漢學背景與理念，深深憂慮西學對日本的負面影響，因而試圖推廣儒家思想的理念。元田輔助天皇的過程中，一度推動過天皇親政運動。由於教學聖旨、推動天皇親政等作為令伊藤博文憂慮侍補利用天皇干涉政府，故侍補一職於 1879 年遭廢除。

然而，元田的理念並沒有因此而終結。國家該不該制定道德教育的方針，道德教育的內容該如何等問題不斷出現，最後，在山縣有朋（1838–1922）擔任總理大臣之際，委託中村正直（1832–1891）編纂有關教育方針的文件，這即是教育敕語最早的草案。不過，後來中村的草案被拋棄，而批判中村草案的井上毅擬定的新草案就成為教育敕語的原案。但是，在擬定過程中，元田積極提出修正意見，因而教育敕語最終仍相當程度上納入了元田的理念。

教育敕語確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津田也批判教育敕語的此一面，但他同時指出教育敕語的其他特色以及其相關問題。其主要論點在「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一句中可見。一般認為這一句是教育敕語的問題所在，但有趣的是，津田並不認為這一句有問題，反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將此句理解為軍國主義思想，並不妥當，既然國家存立，緊急時刻國民投身於國家事務是理所當然的」（津田左右吉，1965e：237）。對他而言，這一句的問題不在於向國民要求為國家獻身，問題在於，教育敕語只強調「緩急」之際，而沒有論及平時奉公的精神。也就是，「簡言之，此敕語並沒有『全體國民為一個結合體，集體的生活存在』此一思想」（津田左右吉，1965e：237）。津田認為，由於中國歷

來沒有形成現代意義的國家，故依據儒家思想的教育敕語缺乏國民貢獻於國家的思想。我們在此可見津田作為現代主義者的一面，津田認為現代國家需要建立「國族（nation）」的觀念，故國民奉公是理所當然的原理。然而，近代以來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日本以「君臣」觀念規範天皇與國民的關係，因而使得天皇在觀念上成為外在於國族的君主，奉公被誤以為服從於天皇，這是教育敕語觀念上導致的問題。如下一節所論，津田視 1931 年以後為特殊時期，而教育敕語以及灌輸其觀念的學校教育，是該時期出現曲解天皇本質的觀念之重要背景（津田左右吉，1963：468）。

最後，津田再簡單提及教育敕語的其他問題，其中「世界性」也是津田在意的論點。教育敕語中有這樣的一句：「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將教育敕語中所揭示的倫理道德視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然而，津田認為，規範國民與國家、皇室之間特殊關係的道德標準不具有世界性的意義，這是顯而易見的。反過來說，教育敕語沒有強調世界性的、人類共通的道德項目，這又是教育敕語的缺陷之一（津田左右吉，1965e：239）。

津田對於教育敕語提出以上的批判，但身為歷史學者，津田也強調就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說，教育敕語中含有這種思想性質是可以理解的。而他也有肯定教育敕語的一面。教育敕語的最後一句為：「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這就表示天皇自己也遵守教育敕語中的道德項目，這種情形在儒家思想中是不可見的。這就是天皇對國民的心情表露，也意味著天皇並不是對立於國民的外在存在，而是與國民同在（津田左右吉，1965e：240－241）。津田極為重視此點，因為這才是日本別於中國的思想特色，他在其他論文中暗諷丸山說：「最近在日本思想的討論中出現這樣的討論，即：

國家作為倫理的實體成為價值內容的壟斷性決定者，而在教育敕語的發布中可見其一端。這種論法完全違背歷史事實，也違背教育敕語所記載的內容。敕語明白揭示天皇本身遵守教育敕語，也就是道德的權威存在於天皇之上」（津田左右吉，1964a：441）。這明顯是津田批判丸山的一段話，由此可見，雖然津田與丸山同樣批判教育敕語，但其分析與理解的方式不同，津田也給予教育敕語一定的正面評價。兩者研究方法上的差異，也導致對十五年戰爭時期的評價之不同。

肆、變質：政治責任

近代日本為何走向破滅，這無非是現代學術界近代日本研究最為重要的主題。明治維新之後的變革自然導致侵略戰爭，還是某時期的變質所導致？對於此點，丸山基本上認為侵略戰爭是近代日本的天皇機制所導致，而津田認為此乃特殊時期的現象，天皇與侵略戰爭無關。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有些學者認為七七事變是時代變化的分水嶺，丸山依據自身的經驗，依然認為九一八事變才是重要的轉機，他親眼目睹滿洲事變之後大眾國族意識昂揚的現象（丸山真男，1996b：20 - 21）。此外，此時期涉及的重要議題是，昭和天皇對於日本的侵略戰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丸山認為昭和天皇並非機器人，如最終宣布終戰，有所作為，便應該負責下台；津田則認為，即便大日本帝國憲法規範天皇的大權，實際上天皇也尊重政府的決定，對十五年戰爭時期日本國的走向沒有產生主導性影響，故沒有任何戰爭責任。以下針對此兩點探析丸山與津田的觀點。

一、關於十五年戰爭時期

就十五年戰爭時期而言，丸山與津田親身經歷此時期，1931年丸山入學於一高，津田年近六十，擔任早稻田大學教授，積極出版研究著作。如前文所述，丸山一高時期遭到特高的審訊，這些經驗讓丸山感受到十五年戰爭時期的變質。不過，丸山的一貫觀點是，十五年戰爭時期所呈現的病理現象實際上自明治以來一直都存在，只不過是十五年戰爭時期明顯凸顯出來而已，故即便十五年戰爭時期呈現與此前不同的現象，它仍是近代日本的本質所導致（丸山真男，1996d：328）。丸山的這種論點連接到〈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中對國體的分析，問題就在於天皇機制的結構。透過教育敕語廣泛普及的國體概念，在國體明徵運動中進一步被推廣，文部省思想局於1937年3月30日出版的《國體之本義（国体の本義）》就是其具體表現。此書將國體定義為：「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天皇奉皇族神敕，永遠統治之。此乃我國萬古不變的國體。而依此大義，作為一大家族國家億兆一心尊奉聖旨，發揮克忠克孝之美德。此乃我國體之精華」（文部省思想局，2014：16），可見其國體思想繼承教育敕語的理念。此書也將天皇描述為「現御神」，強調其祖先連接到神話的一面，由此為「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添加神秘意味（文部省思想局，2014：30）。在天皇與民的關係上，本書相當強調「忠」：「忠將天皇奉為中心，對天皇絕對隨順之道。絕對隨順意味著捨我去私，一心侍奉天皇」（文部省思想局，2014：40），而如教育敕語所言，侍奉天皇就「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忠等於孝，故：「忠孝一路真是我國體之精華，國民道德的要諦」（文部省思想局，2014：53）。津田批判教育敕語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而繼承教育敕語理念的本書中亦可見儒家思想的影響，實際上本書明白承認：「作為實踐之道，儒教具備優異內容，頗具價值」（文部省思想局，2014：133）。只是，儒家思想有其不完美之處，儒家思想含有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易姓革命、禪讓及放伐之說，就此意義上，日本「醇化」了儒家思想，從儒家思想中去除掉易姓革命等含義，使之成為日本儒教，這就是儒家思想貢獻於日本國民道德之要訣（文部省思想局，2014：133 - 134）。

那麼，本書為何不斷強調日本的國體以及其特色？在其動機中，可見日本進入十五年戰爭時期的重要思想背景，即：對於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批評。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接受西方文明，因而導致許多弊端，風俗敗壞。此背後有西方個人主義思想，《國體之本義》並非拒絕吸納西方文明，但主張必須經過日本國體之醇化，如此才能符合日本國體（文部省思想局，2014：139 - 140）。考慮到擬定教育敕語的背景，我們可理解近代日本一直存在抗拒西方個人主義的思想，而此思想特色促進天皇主義的國體思想，丸山在此點上指出近代日本一貫的特色。1941年7月，文部省編輯出版《臣民之道（臣民の道）》，再度繼承教育敕語與《國體之本義》的基本觀念，進一步強調：「平時我們所說的私生活，畢竟是臣民之道的實踐，作為輔弼天業並臣民從事之業，具有公意義」（文部省教學局，2014：199）。丸山在〈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中引用此段文句說：「我國未嘗將私直接承認為私……這些結構並非伴隨極權主義的流行而出現，而內在於日本國家結構之中」（丸山真男，1995b：22）。在此亦可見丸山並不將十五年戰爭時期視為與近代日本本質無關的特殊時期。

針對丸山的分析，如前文所述，津田表明批判態度。津田認為

教育敕語明確規範天皇也需要遵守倫理道德，丸山所論的思想觀念是部分天皇主義者所倡導，不可將之視為天皇以及近代日本的本質。因此，也不可將十五年戰爭時期的現象擴大理解為近代日本的本質：「另外，有人誤以為近年才出現的所謂超國家主義者言說所呈現的思想，從明治時代開始就佔有支配性地位，因而推測維新的性質，甚至溯及到古代以來的全體歷史，由此認為我國以及政治的本質在此。以近年的現象推測維新和上代，可能是因為目前在言論界活躍的人們就其年齡而言，只有宣傳超國家主義或政策上實行其主義的時代之體驗，進而自然得出這種結論」（津田左右吉，1964a：443－444），可見津田在此又暗諷丸山。對此見解，丸山也明確反駁：「我甘心接受本論文的『抽象化』是過於片面的批判，但另一方面，無論當時或現在，我絕對無法贊成如此的見解，即：在其論文中所指出的天皇制精神結構的病理只不過是『非常時期』的狂亂所導致的例外現象（典型例子如津田左右吉博士的主張）」（丸山真男，1995a：249）。

丸山與津田之間許多不同見解，或許是兩者所屬的學科性質之差異所致：丸山是屬於社會科學的政治學者，津田是屬於人文學科的歷史學者。丸山自己也意識到此學科背景的差異，他於1940年發表〈近世儒教發展中徂徠學的特質以及其與國學的關聯（近世儒教の発展における徂徠学の特質並にその国学との関連）〉之際寄信給津田，信中寫到：「德川時代的思想如何投映在專攻西洋社會科學者眼裡，若此點能或多或少引起老師的關心，幸甚至哉」（1996c：315）。丸山採取社會科學的方法，這是理解丸山天皇論的關鍵之一。丸山在反駁津田的文章中提到：「當然在此描繪的日本國家主義意識型態結構只不過是這種意圖的一個歷史抽象，即：著眼於在太平

洋戰爭中極端呈現的型態，將諸契機盡可能系統性地放置於明治以後國家體制中。因此，在此一開始就捨棄日本天皇制意識型態發展階段之區分或立憲主義與絕對主義之間關聯等問題。我描繪的圖式是否為恣意的構想，這只能等待讀者的批判，但這種『抽象』本身應該並非無益於對於之後的論文中所述的戰後天皇制意識型態之細分化現象進行測量」（丸山真男，1995a：248）。丸山為了加強自身研究方法的正當性，最後特地引用黑格爾《歷史哲學》中論及中世教會的腐敗為必然現象的一段話（丸山真男，1995a：249 - 250）。可見，丸山身為社會科學家有意採取抽象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抽取原理而指出天皇以及近代日本的本質。只要採取此類方法，自然不會強調十五年戰爭時期的特殊性。

相形之下，津田認為十五年戰爭時期為特殊時期，而且此時期所倡導的天皇形象是被扭曲的。津田批判十五年戰爭時期軍方利用天皇的情形說：「最近有關所謂天皇制的討論興起，這似乎意味著部分國民對於皇室的永久性產生疑惑。產生這種疑惑的主要原因在於，軍方以及配合軍方的官僚利用國民對皇室的敬愛之情與憲法上的規定，曲解國史而將之當作依據，主張政治應該由天皇親政，或者宣傳現實如此，再加上天皇應具備專制君主的權威，或說成實際具備一樣，進而將軍方恣意的作法偽裝成天皇的命令」（津田左右吉，1963：468 - 469）。簡言之，津田認為，十五年戰爭是軍方暴走而政府沒能控制的結果，此點與天皇無關。主張此觀點不僅是因為津田有意維護天皇，也關係到津田身為歷史學者的歷史觀。津田於1950年出版《必然・偶然・自由》一書，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的同時，展開津田本人的歷史觀。他認為，我們觀看過去時，能夠分析出其現象出現的必然脈絡與因素，但這並不代表歷史具備必

然發展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路線並非單一的，歷史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所創造，責任由此產生（津田左右吉，1965c）。津田也與丸山同樣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教育敕語有其缺陷，但不能因而將十五年戰爭此一歷史現象視為結構的本質所導致，這都是人的判斷錯誤或能力不足所導致的結果。對津田而言，我們必須了解的是，導致十五年戰爭此一人為過失的是軍方和政府，並非昭和天皇。

那麼，津田如何理解天皇？津田在十五年戰爭時期受到的委屈遠超過丸山，如前文所述，津田在東京大學上課之後開始遭受右派人士的抨擊，最終導致所謂津田事件。就大背景而言，津田強調日本和中國的差異，進而主張「東亞」觀念不成立，這就引起當時積極提倡亞洲主義的右派人士之不滿。不過，津田的天皇觀另有跟這些天皇主義者衝突之處，因為津田透過文獻分析法，否定《古事記》等書籍所記載的天皇神話以及一些內容。在他看來，這些故事是後人偽造的結果，並非史實。這些論述就成為以津田違反出版法為由被提告的理由，最終《古事記及日本書紀之研究（古事記及日本書紀の研究）》等書被列為禁書，或遭刪減部分內容。如此看來，津田是十五年戰爭時期的受害者之一。但是，有趣的是，津田並沒有那麼看重這件事：「那件事被誤解甚深，並非輿論界所說的政府鎮壓事件。我在法院儘量詳細說明學問的性質、研究方法以及被詢問的事宜，故我的感覺像是老師向學生解釋。輿論說得像我在法庭鬥爭，但這是錯誤的」（大久保利謙，1963：327－328）。就像津田在東京大學上完課後被右派學生逼問時冷靜回應一樣，津田並沒有因上法庭而情緒化。這種冷靜理性的態度在他的天皇論中亦可見。

津田無疑尊敬天皇，然而，他不會因此提倡天皇親政或天皇的專制體制，因為對他而言，天皇一直以來的特徵就是日本民族的象

徵，正因為天皇沒有動用權力，才不會有失政的機會，所以能夠持續存在。天皇的起源無法考證，但重點就在於，無法考證起源而歷史上存續的事實就自然被視為天皇的本質，這種永久性的確立隨之產生權威（大久保利謙，1963：446－460）。這樣的天皇本質上絕不具備壓抑國民自由思想的作用，史實上也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津田左右吉，1966：150－151）。簡言之，「沒有參與政局的皇室之作用和本質何在？就在於『日本國為統一的獨立國家，且日本國永久存在』此件事的具體象徵」（津田左右吉，1965b：341）。有趣的是，不從必然性角度理解歷史的津田在天皇的分析中依然重視天皇的本質，而因為天皇的本質是與權力無關的象徵性，故雖然十五年戰爭時期為歷史進展中的特殊時期，但此特殊現象與天皇的本質並沒有關聯性。至此我們理解到，雖然採取的分析方法不同，但丸山與津田都致力分析天皇的本質，這就是他們的天皇論可被視為戰後日本天皇論起點的重要理由。

二、關於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

親身經歷十五年戰爭時期的丸山與津田，都感受到日本的政治社會情形於十五年戰爭時期有所轉變，但對於導致其變化的原因持有不同的看法：丸山認為此種變化實際上是天皇的本質所致，而津田認為此變化與天皇本質無關。兩者的分析從歷史現象進一步滲入到天皇本質的問題，進而連接到天皇存廢之主張。然而，天皇的本質與昭和天皇個人的戰爭責任是不同的問題，他們如何看待昭和天皇個人的戰爭責任？此問題的焦點在於，昭和天皇對於十五年戰爭時期的變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關於昭和天皇在十五年戰爭時期的言行，過去僅能透過當時接觸天皇的侍從等人公開出版的私人日記

或回憶錄瞭解，但隨著《昭和天皇實錄》問世，過去日記中所記載的許多言行現已由官方證實。值得一提的是，擔任西園寺公望（1849–1940）秘書的原田熊雄的日記《西園寺公與政局（西園寺公と政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丸山就是負責編輯這套書的人員之一。可見，雖然丸山的主要關懷在於天皇機制的結構問題，但也依然對昭和天皇個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持有很大的關心。只是，我們不得忽略丸山曾經對昭和天皇持有某種好感，對他而言撰寫批判天皇的論文並非簡單的過程，他回顧當時撰寫論文的過程說：「我反覆說服自己：『這是學術論文。所以論及天皇或皇室的文字也不需要使用敬語』。後人或許以為此篇論文是我的『思想』理所當然的呈現，但其每一行的下筆就是對於過去的自己拼命說服的過程」（丸山真男，1996b：35）。

後來丸山明確論及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是於 1956 年發表的〈戰爭責任論的盲點（戦争責任論の盲点）〉。如前文所述，文中丸山用強烈的語詞批判天皇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與權威，「對那十幾年的政治過程與其結果沒有責任？政治倫理上的常識不允許這種說法」（丸山真男，1995c：163）。這是概括性的論述，並沒有涉及昭和天皇的具體言行，但丸山在另外一處論及昭和天皇言行的問題，此問題主要呈現在天皇機關說事件上。

天皇機關說事件的主角是美濃部達吉，美濃部的憲法學說將作為團體的國家當作解釋憲法的出發點，進而將天皇定義為最高機關。美濃部深知以「機關」來形容天皇稍有傷害尊王心之感，但他認為此乃將國家定義為團體的原理引導的當然結果，假設將君主規定為統治權的主體，這反而違反日本的國體（美濃部達吉，1912：66）。然而，原本被公認為主流學說的天皇機關說，在十五年戰爭

時期遭受右派人士的攻擊，被指責為其論述違反國體。¹⁵ 美濃部成為右派人士攻擊的對象，是有其背景的。1930 年日本政府簽訂「倫敦海軍條約」之際，海軍利用憲法所規定的統帥權批判政府違反規定，但美濃部援用自身憲法原理維護政府；另外，陸軍省於 1934 年出版《國防的本義及其強化的提倡（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之際，美濃部徹底批判其內容（山崎雅弘，2017：107）。在此背景之下，於 1935 年 2 月 18 日，退役軍人菊池武夫（1875–1955）在貴族院展開對美濃部的批評。一開始他並非專門攻擊美濃部，菊池列舉他所認為提倡違反國體學說的學者，美濃部只是其中一位。對於此種批判，文部大臣以及岡田啟介首相都提出美濃部等人的學說不構成問題的回應，菊池也當場暫時接受此說法，沒有追問。但右派人士的攻擊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他們強硬的態度逐漸壓到議場，於 3 月在貴族院和眾議院通過有關明徵國體的建議案。4 月，美濃部遭受檢事局的質詢，最後《憲法撮要》等三本著作以違反出版法為由，列為禁書。岡田首相也被迫發表兩次「國體明徵聲明」（1935 年 8 月 3 日以及 10 月 15 日），右派人士試圖強化國體概念的運動獲得全面勝利。《國體之本義》便是在此脈絡下出版的。

天皇機關說事件是天皇主義者所引起，但實際上，天皇並沒有支持這些天皇主義者的所作所為，反而支持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本庄繁，2005：203–206）。在十五年戰爭時期，天皇不認同天皇主義者或軍方的言論不勝枚舉，對於天皇機關說的看法亦如此。一般

15. 如何解釋天皇在憲法上的地位，是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時早已發生過的課題，主要可分為一木喜德郎（1867–1944）、美濃部達吉等的天皇機關說派，以及穗積八束（1860–1912）、上杉慎吉（1878–1929）等的天皇主權說派。此部分的進一步論述可參考《近代日本法思想史入門》（大野達司、森元拓、吉永圭，2019）的第五章。

而言，依此證明天皇沒有主導戰爭，進而得出天皇沒有戰爭責任的主張者較多，但是，對於此點，丸山卻說：「在我看來，若是如此，關於涉及自身國法上地位的此問題，天皇為何沒有將私人感想進一步擴大到公開見解？這一點我無法接受。在僅一年後的二二六事件中說出『朕自行討伐』而明白表達自己判斷的天皇，沒有理由無法公開對天皇法理上的地位發言。這並非積極肯定特定學說的問題，只要對於將機關說視為『反國體』的言論，提出消極發言就足夠的。或許這種說法像克麗奧佩脫拉的鼻子一樣，但假如此時天皇對於親信說的這些發言被公開的話，我認為此後的時代動向應該會與實際情形不同的方向發展的」（丸山真男，1996b：28）。可見，丸山並非批判昭和天皇對於戰爭有積極作為，而是指責昭和天皇不作為之政治責任。

十五年戰爭時期昭和天皇的言行已被廣泛討論，如井上清於1975年出版的《天皇的戰爭責任（天皇の戦争責任）》列舉十五年戰爭時期昭和天皇的言行，雖然井上的目的是主張天皇有戰爭責任，但是，即便採用同樣的資料，也能夠得出天皇沒有主導戰爭的結論，這種言行與責任的曖昧關係是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論至今爭論不休的原因。實際上，津田依然不認為昭和天皇有戰爭責任，其理由極為簡單，即：「明確的事實是，對於政府決定而議會贊成之事，天皇從來沒有拒絕過」（津田左右吉，1966：144）。事實上，昭和天皇從來沒有否決過政府或大臣上奏的案件。這是因為昭和天皇並沒有如天皇主義者般嚮往天皇親政，反之，昭和天皇的理念為君主立憲，故認為天皇不該否決政府的上奏。他說：「天皇必須依據憲法行動……無論內治或外交，憲法上的責任者慎重審議並擬定方策，而依據規定提出並請求裁可之際，即使我不滿意，也必須認可，沒

有其他方法……專制政治國就算了，我身為立憲國的君主，不能這麼做」（藤田尚德，2015：208）。可見昭和天皇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觀點相當接近美濃部，因此盡量約束自己，避免自己的意見干涉政府的決定。

當然，如昭和天皇自己所述，也有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影響政局的例子，著名的是二二六事件及終戰的決定，昭和天皇談論二二六事件時說：「只有此時與終戰時兩次令政府積極實行自己的想法」（寺崎英成、マリコ・テラサキ・ミラー編著，1995：38）。但實際上，即便昭和天皇沒有否決過上奏，亦可在正式上奏之前表達意見影響政局，例如在 1938 年的張鼓峰事件中，天皇否決過陸軍「內奏」的案件，當時昭和天皇甚至說到：「歷來陸軍的作法不可原諒。就像是滿洲事變的柳條溝，或此次事件的開端蘆溝橋，完全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只依駐外軍隊的獨斷，有時候還採取作為朕的軍隊不該有的卑劣方法……若沒有朕的命令，以後連一兵都不准動」（原田熊雄，1952：51）。此件事又導致陸軍大臣自行辭職，可見天皇依然擁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丸山就說：「如有些資料所顯示，在此最為重要的時期，天皇並非蓋章機器人」（丸山真男，1995c：163）。既然如此，昭和天皇是否有辦法阻止戰爭的發生？

對於此種意見，津田明確持有否定的態度：「國家社會的情勢，有時候單靠一個人的力量難以扭轉，即使是君主的地位，也是如此……當時和平主義的力量微弱到，持有和平主義的內閣主宰者都無法壓抑軍方的程度……那是具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抱有和平的希望，但這些希望完全沒能成為扭轉政治的力量的時期」（津田左右吉，1966：144 - 145），不該過度重視天皇能起的作用。如果說造成這種情勢才是問題的重點，而昭和天皇對此沒有責任，那麼，

到底誰該負責任？除了軍方與政府之外，津田最為強調的是，日本國民要負責任：「即便有很大的限制，國民也持有透過議會參政的權能，要盡其義務，但國民卻忘卻其義務而沒能發揮權能。這的確是因為被軍部的宣傳所欺騙，且軍部利用刑罰以及其他方法施加強壓的關係，但是這就表示國民的知性弱到被欺騙，也沒有反駁或抵抗強壓的氣力，如此不得不說這都是國民自己的責任」（津田左右吉，1966：146－147）。這就是津田戰爭責任論的最終結論，都是因為國民智性不足而導致戰爭，假設國民不懂得自我反省，一味將責任歸咎到天皇身上，那麼未來的日本也可能重蹈覆轍。針對天皇廢除論，津田也如此回應：「他們可能認為廢止天皇就能施行民主政治，但只要國民具備施行民主政治的資質與能力，即使天皇存在也能施行民主，或者說，因為其存在，能夠期待民主政治更加有效地運作」（津田左右吉 1966：148）。對津田而言，現代民主政治的關鍵就在於國民，國民的素質決定民主政治的成敗，或許因為如此，津田戰後積極發表評論文，以期提升日本國民的智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如導論中所介紹，和辻主張天皇在文化意義上的象徵性，雖然此點與強調天皇政治權威的津田有所不同，但是，在和辻看來，國民的全體意志與天皇的意志相一致的理論前提之下，日本發動的戰爭也被理解為依據國民的全體意志所進行（和辻哲郎，1962a：340），亦即：和辻與津田同樣認為日本國民該負起戰爭責任。支持天皇的他們有此種論述並非只為天皇脫罪，兩者不斷強調的「國民」概念應理解為現代國家中的國族（nation），他們強調的所謂「象徵性」，即是日本國族的象徵，此乃日本的國族建構過程中出現的一種論述方式。其實，丸山的討論也可在同樣的脈絡中理解。由於丸山以「近代（現代性）」為分析日本的理論工

具，故往往被形容為「近代主義者」。雖然對此點的看法褒貶不一，但這就意味著丸山追尋的也是健全的日本國族，他只不過是認為天皇的存在是其最大障礙而已。如此看來，天皇與現代性的關聯，便是丸山與津田分析天皇的基本框架，因此，在後續的天皇論當中，亦有出現從此角度分析天皇的研究。例如，安丸良夫（1934–2016）在《近代天皇觀的形成（近代天皇像の形成）》中提到：「近代天皇制確實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統合原理，但結合上述觀點來看，近代日本與西歐各國在世界史上基本具有同時代性，對其特殊性應該在近代國民國家模式這樣一個整體框架中予以考察。」（安丸良夫，2010：211）。後續的天皇論如何繼承並發展天皇與現代性的討論，也是我們未來可進一步探討的重要研究課題。

伍、結論

日本與美國開戰的初期屢戰屢勝，但在中途島海戰等戰役中戰敗後，日本趨於劣勢，盟軍開始討論戰後如何處理日本。1943 年 11 月 23 日在開羅會談中，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向蔣介石（1887–1975）詢問天皇制度的存廢問題，而蔣介石回答應該由日本國民依照自己的意志決定，這就成為盟軍的基本方針（武田清子，1978：166 – 173；黃自進，2012：341 – 346）。然而，即便保留制度，也需要另外研討昭和天皇個人的戰爭責任。實際上在美國與國際輿論中，要求天皇退位的聲浪頗高，因此如何處置昭和天皇就成為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佔領日本初期最為重要的課題。關於麥克阿瑟的天皇觀，除了他親自與昭和天皇會見的經驗之外，對其影響最深的是當時擔任他軍事秘

書的費勒斯（Bonner Fellers，1896–1973）。費勒斯是麥克阿瑟幕僚中的知日派，與麥克阿瑟一起來到日本後，透過與日本友人的交流，深入了解到日本國民對天皇的情感極深。是故，費勒斯於 1945 年 10 月 2 日寫一篇備忘錄給麥克阿瑟，強調假設審判天皇的戰爭責任，就有可能發生動亂，這將不利於美國（山極晃、中村政則編，1990：515–516）。接著，麥克阿瑟於 1946 年 1 月 25 日向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報告說，倘若審判天皇就可能引起動亂（山極晃、中村政則編，1990：463–464），可見其論調與費勒斯相同。¹⁶ 所謂美國的利益即是維護並擴大自由主義的陣營，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說，當時他對日的寬厚政策引起了蘇聯的反彈，但他「希冀通過自由世界的理念用和平的方式來贏得日本人的心」（麥克阿瑟，2017：283）。他在向艾森豪的報告中也提及，發生動亂而失去自由的大眾最終有可能選擇共產主義，如此至少需要百萬軍隊來應付。如此看來，當時美國已經開始意識到共產主義陣營的興起，這可能也是美國決定不究責天皇戰爭責任的重要背景。如此一來，如日本政府所願，最終天皇沒有成為東京審判的對象，至今沒有認定天皇的戰爭責任。然而，戰後日本知識分子不滿於這種充滿政治考量的天皇無罪論，進而展開圍繞天皇戰爭責任的激烈論戰。本文討論的丸山真男與津田左右吉即是戰後初期對此提出見解的代表人物。

本文試圖從政體（法律責任）、國體（思想結構性責任）、變質（政治責任）的角度分析丸山真男與津田左右吉對天皇戰爭責任以及天皇的看法。丸山認為不僅昭和天皇有戰爭責任，天皇本身亦

16. 關於費勒斯與天皇無罪論，可參考《昭和天皇：兩種「獨白錄」（昭和天皇：二つの「獨白錄」）》（東野真，1998）。

需要廢除；津田則認為昭和天皇沒有戰爭責任，天皇也沒有廢除之必要。雖然兩者在天皇戰爭責任的議題上出現嚴重分歧，但實際上對於政體、國體以及變質時期的認知不見得全都衝突；丸山與津田都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有其兩面性，即：憲政原理約束天皇的一面，以及如大權的規範所示，展現天皇絕對君主的一面。丸山依後者認為，無論法理上的解釋如何，擁有這些權力與權威的天皇該負政治責任。只是，丸山也相當肯定大日本帝國立憲主義的一面，並不認為大日本國憲法是導致日本戰爭的主因。相較於此，津田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法理上將責任歸屬於天皇，因而嚴厲批判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起草者。但是，津田也認為，由於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天皇沒有行使這些大權，所以近代日本的政治得以順暢運行，就此意義上，津田也並非那麼重視憲法在形式上的規範。一言以蔽之，雖然丸山與津田都指出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缺點，但都沒有將之視為討論戰爭責任的關鍵因素。

與大日本帝國憲法相比，丸山更為重視教育敕語，因為教育敕語所象徵的、以天皇為核心的國體結構，才使得日本國民失去自主倫理判斷能力，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感。丸山的這種將歷史現象抽象化而透視結構的分析方法可說是他身為社會科學家的一種展現。相形之下，雖然津田也指出如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等教育敕語的缺點，因而認為教育敕語的普及為十五年戰爭時期提供重要準備，但是，他也認為教育敕語的理路並非如丸山所說的天皇壟斷倫理價值，因為教育敕語規範天皇也要遵守這些倫理。亦即，在教育敕語的解釋上，兩者出現重要分歧，從而在教育敕語與天皇戰爭責任的關聯上，出現不同的觀點。

至於十五年戰爭時期，兩者都認為是變質的時期。只是，在其

變質與天皇的關聯上，又出現不同見解。丸山認為，十五年戰爭時期實際上是近代日本國體的本質所導致，並非偶然現象，在此亦可見丸山身為社會科學家的觀點。與此相比，身為歷史學者，津田不認同將歷史現象抽象化而將問題歸咎於天皇本質的討論方式，強調歷史為人的自由意志所創造，十五年戰爭是軍方與政府的失策所致，與天皇無關。在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議題上，丸山認為天皇有辦法阻止戰爭，故負有不作為之政治責任，該下台。津田則認為走向戰爭是當時社會的趨勢所致，並非天皇單靠自己的能力就能扭轉，就此意義上國民該負最大責任。

丸山與津田的討論提供我們理解天皇戰爭責任論的雛形，也進一步讓我們思考天皇的本質。如果「天皇制」具備有別於一般君主制的特色，我們該如何理解之？丸山指出天皇壟斷倫理價值的思想結構性問題，此結構使日本國民喪失責任感。責任感的喪失此議題令人想起米爾格蘭實驗（Milgram experiment），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 1933–1984）明白指出：「服從權威造成的最深刻影響，就是責任感的喪失」（米爾格蘭，2015：43）。丸山強調，天皇並非獨裁者，這就意味著天皇的本質不在於權力。如果天皇的「論理」導致失去責任感的「心理」，這種原理可以從「權威」的角度理解。就此點而言，津田的天皇觀也相當相似，他並不認為天皇是掌權者，而是受國民尊敬的權威者。這或許是丸山與津田不那麼重視大日本帝國憲法與天皇關連性的原因，因為憲法規範的是權力結構。如此看來，透過天皇戰爭責任的論辯，丸山和津田對天皇本質的觀點在權威原理上呈現一致。正因為如此，無論支持還是否定，後續的許多天皇論將權威視作其討論焦點，作為戰後日本天皇論的起點，此乃丸山和津田論點的重要貢獻。

然而，君主本來就具備某種權威，權威不見得是完全區分一般君主和天皇的標準。我們能否在丸山和津田的討論中，進一步汲取所謂「天皇制」的特點？本人認為，我們或許可以更加重視他們指出的天皇特質：永久性。丸山以「縱軸（時間性）的延長即圓（空間性）的擴大」來描述天皇的國體結構，其中縱軸的延長是關鍵，因為具備永久性的天皇才能無限延長縱軸，這正是萬世一系的概念。津田從學術角度否定天皇的神話故事，但依既有文獻，我們無法確切考證天皇的起源，這種起源的不確定性容易產生永久性觀念，他認為正是這種永久性產生天皇的權威（大久保利謙，1963：460）。丸山從負面角度指出天皇以永久性為原理而產生的權威結構，津田則從正面角度看待之，但兩者對天皇本質的分析在「永久性」此點上又得到一致。本人分析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家庭革命論時曾指出，「永久性」是在中國傳統家庭中加強權威關係的關鍵因素，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強烈批判的就是這種產生極大壓迫的永久性權威主義關係（安井伸介，2017）。我們在天皇的權威原理中同樣可見永久性觀念，也許可以如此說：永久性才是區分一般君主制和所謂天皇制的關鍵。倘若我們能將永久性視為獨立的關鍵概念，不但有助於理解天皇，也能為政治學提供重要的理論視角。如此天皇就能成為政治理論的分析對象，本人期望未來在此方面進一步深化研究。

參考書目

- 三宅喜二郎。2001。〈国敗れて現われた忠臣〉。霞關會著、河野洋平編《劇的外交：戦争、敗戦、そして復興》：50 - 109。東京：成甲書房。（Miyake, Kijiro. 2001. “The Country is Destroyed, yet Loyal Subjects Remain.” in Yohei Kono. ed. *Dramatic Diplomacy 1931-1951*: 50-109. Tokyo: Seikoshobo.）
- 下條芳明。2005。《象徵君主制憲法の20世紀的展開—日本とスウェーデンとの比較研究》。東京：東信堂。（Simojo, Yoshiaki. 2005. *The Symbolic Monarchy and Constitu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 Study on the Comparison of Japan with Sweden*. Tokyo: Toshindo Publishing Company.）
- 丸山真男。1995a。〈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第一部 追記および補注〉。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 第六卷》：247 - 296。東京：岩波書店。（Maruyama, Masao. 1995a. “Postscripts and Supplementary Notes of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Part. 1.” in Hiroaki Matsuzawa and Michiari Uet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ao Maruyama Volume 6*: 247-296. Tokyo: Iwanami Shoten.）
- 丸山真男。1995b。〈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 第三卷》：17 - 36。東京：岩波書店。（Maruyama, Masao. 1995b. “Theory and Psychology of Ultra-nationalism.” in Hiroaki Matsuzawa and Michiari Uet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ao Maruyama Volume 3*: 17-36. Tokyo:

Iwanami Shoten.)

丸山真男。1995c。〈戦争責任論の盲点〉。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 第六卷》：159 - 165。東京：岩波書店。

(Maruyama, Masao. 1995c. “A Blind Spot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War Responsibility.” in Hiroaki Matsuzawa and Michiari Uet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ao Maruyama Volume 6*: 159-165. Tokyo: Iwanami Shoten.)

丸山真男。1996a。〈ある日の津田博士と私〉。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 第九卷》：121 - 130。東京：岩波書店。

(Maruyama, Masao. 1996a. “Dr. Tsuda and me on a Day” in Hiroaki Matsuzawa and Michiari Uet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ao Maruyama Volume 9*: 121-130. Tokyo: Iwanami Shoten.)

丸山真男。1996b。〈昭和天皇をめぐるきれぎれの回想〉。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 第十五卷》：13 - 36。東京：岩波書店。(Maruyama, Masao. 1996b. “Fragmentary Memories of the Showa Emperor.” in Hiroaki Matsuzawa and Michiari Uet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ao Maruyama Volume 15*: 13-36. Tokyo: Iwanami Shoten.)

丸山真男。1996c。〈津田左右吉宛〉。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 第十六卷》：315 - 316。東京：岩波書店。(Maruyama, Masao. 1996c. “A Letter for Sokichi Tsuda.” in Hiroaki Matsuzawa and Michiari Uet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ao Maruyama Volume 16*: 315-316. Tokyo: Iwanami Shoten.)

丸山真男。1996d。〈戦争責任について〉。松澤弘陽、植手通有

編《丸山真男集 第十六卷》：323 - 333。東京：岩波書店。

(Maruyama, Masao. 1995d. “On the War Responsibility.” in Hiroaki Matsuzawa and Michiari Uete.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sao Maruyama Volume 16*: 323-333. Tokyo: Iwanami Shoten.)

大久保利謙。1963。〈津田左右吉：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残映〉。
朝日ジャーナル編集部編《日本の思想家（3）》：319 - 334。
東京：朝日新聞社。(Okubo, Toshiaki. 1963. “Sokichi Tsuda: A Vestige of Meiji Nationalism.” in Asahi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ed. *Japanese Thinker 3*: 319-334. Tokyo: Asahi Shimbun Company.)

大井健輔。2015。《津田左右吉、大日本帝国との対決》。東京：勉誠出版。(Oi, Kensuke. 2015. *Sokichi Tsuda: Confrontation with Empire of Japan*. Tokyo: Bensei Publishing.)

山崎雅弘。2017。《「天皇機関説」事件》。東京：集英社。(Yamazaki, Masahiro. 2017. *The Emperor-Organ Incident*. Tokyo: Shueisha.)

山極晃、中村政則編。1990。岡田良之助譯。《資料日本占領 1：天皇制》。東京：大月書店。(Yamagiwa, Akira and Masanori Nakamura. eds. 1990. Okada Ryonosuke. trans.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Japan under the Occupation 1: Tenno System*. Tokyo: Otsuki Shoten.)

井上清。1975。《天皇の戦争責任》。東京：現代評論社。(Inoue, Kiyoshi. 1975. *The Emperor's War Responsibility*. Tokyo: Gendai Hyoronsha.)

文部省。1909。《漢英佛獨教育敕語譯纂》。東京：國定教科書共

同販賣所。(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09. *The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English, French, & German*. Tokyo: Government-designated Textbook Joint Sales Company.)

文部省思想局。2014。〈國體の本義〉。呉 PASS 出版部編《戦前の国民教育》：9 - 140。廣島：呉 PASS 出版。(Education Ministry's Thought Control Bureau. 2014.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National Polity." in Kure PASS Publishing Company. ed. *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ewar Period*: 9-140. Hiroshima: Kure PASS Publishing Company.)

文部省教學局。2014。〈臣民の道〉。呉 PASS 出版部編《戦前の国民教育》：141 - 214。廣島：呉 PASS 出版。(Education Ministry's Patriotic Education Bureau. 2014. "Road of Subjects." in Kure PASS Publishing Company. ed. *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ewar Period*: 141-214. Hiroshima: Kure PASS Publishing Company.)

犬丸義一。1987。〈マルクス主義の天皇制認識の歩み〉。遠山茂樹編《近代天皇制の展開——近代天皇制の研究 II》：227 - 286。東京：岩波書店。(Inumaru, Giichi. 1987. "The Process of Marxism Understanding about Tenno System." in Shigeki Toyama. 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nno System*: 227-286. Tokyo: Iwanami Shoten.)

本庄繁。2005。《本庄日記》。東京：原書房。(Honjo, Shigeru. 2005. *The Diary of Shigeru Honjo*. Tokyo: Harashobo.)

石井良助。1982。《天皇——天皇の生成および不親政の伝統——》。

- 東京：山川出版社。（Ishii, Ryosuke. 1982. *Tenno: The Formation of Tenno and Tradition of Indirect Rule*.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 石堂清倫、山邊健太郎編。1961。《コミンテルン：日本にかんするテーゼ集》。東京：青木書店。（Ishitou, Seirin and Kentaro Yamabe. eds. 1961. *Comintern: The Platforms On Japan*. Tokyo: Aoki Shoten Publishing Company.）
- 伊藤博文。2019。宮澤俊義校註。《憲法義解》。東京：岩波書店。（Ito, Hirobumi. 2019. proofreading and annotation by Toshiyoshi Miyazawa. *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mpire Japan*. Tokyo: Iwanami Shoten.）
- 安井三吉。2016。〈「十五年戦争」と「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呼称の創出とその展開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37：81－99。（Yasui, Sankichi. 2016. “On the Name Generation of 15 Years War and Asia Pacific War and their Developm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37: 81-99.）
- 寺崎英成、マリコ・テラサキ・ミラー編著。1995。《昭和天皇独白録》。東京：文藝春秋。（Terasaki, Hidenari and Mariko Terasaki Miller. eds. 1995. *Memoir of the Showa Emperor*. Tokyo: Bungeishunju.）
- 江口圭一。1991。《十五年戦争小史（新版）》。東京：青木書店。（Eguchi, Keiichi. 1991. *A Short History of Fifteen Years War*. Tokyo: Aoki Shoten Publishing Company.）
- 佐佐木惣一。1949。〈國體は變更する〉。佐佐木惣一編《天皇の國家的象徵性》：21－35。東京：甲聞社。（Sasaki, Soichi. 1949.

“National Polity will Change.” in Soichi Sasaki. ed. *Tenno as National Symbol*: 21-35. Tokyo: Kobunsha.)

坂田吉雄。1984。《天皇親政：明治期の天皇観》。京都：思文閣出版。（Sakata, Yoshio. 1984. *The Emperor's Direct Administration: A View on the Emperor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Kyoto: Shibunkaku.）

赤坂憲雄。2019。《象徴天皇という物語》。東京：岩波書店。（Akasaka, Norio. 2019. *The Story of the Symbolic Emperor*. Tokyo: Iwanami Shoten.）

和辻哲郎。1962a。〈国民全体性の表現者〉。安倍能成等編《和辻哲郎全集 第十四卷》：329 - 354。東京：岩波書店。（Watsuji, Tetsuro. 1962a. “The Symbol of Whole Nation.” in Yoshishige Abe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etsuro Watsuji Volume 14*: 329-354. Tokyo: Iwanami Shoten.）

和辻哲郎。1962b。〈国体変更論について佐々木博士の教えを乞う〉。安倍能成等編《和辻哲郎全集 第十四卷》：355 - 368。東京：岩波書店。（Watsuji, Tetsuro. 1962b. “Seek Advice from Dr. Sasaki about the Change of National Polity.” in Yoshishige Abe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etsuro Watsuji Volume 14*: 355-368. Tokyo: Iwanami Shoten.）

東野真。1998。《昭和天皇：二つの「独白録」》。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Higashino, Makoto. 1998. *The Showa Emperor: Two Kinds of Memoirs*. Tokyo: NHK Publishing, Inc.）

武田清子。1978。《天皇観の相剋：1945 年前後》。東京：岩波書店。（Takeda, Kiyoko. 1978. *The Conflict Among the View of*

Tenno: Around 1945. Tokyo: Iwanami Shoten.)

河西秀哉。2010。《「象徵天皇」の戦後史》。東京：講談社。

(Kawanishi, Hideya. 2010. *A Postwar History of Symbolic Emperor*. Tokyo: Kodansha.)

津田左右吉。1963。〈日本の国家形成の過程と皇室の恒久性に関する思想の由来〉。津田左右吉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三卷》：439 – 473。東京：岩波書點。(Tsuda, Sokichi. 1963. “A Process of Japanese Nation-building and the Origin of thought of Eternity on the Imperial Family.” in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3*:439-473.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4a。〈メイジ維新史の取り扱いについて〉。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八卷》：417 – 444。東京：岩波書店。(Tsuda, Sokichi. 1964a. “On Handling of History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8*: 417-444.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4b。〈明治憲法の成立まで〉。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八卷》8：338 – 415。東京：岩波書店。(Tsuda, Sokichi. 1964b.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8*: 338-415.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5a。〈ニホン人の生活の反省〉。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三卷》：3 – 17。東京：岩波

書店。(Tsuda, Sokichi. 1965a. “Reflection on the Japanese Way of Life.”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23*: 3-17.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5b。〈日本の皇室〉。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三卷》：338 - 355。東京：岩波書店。
(Tsuda, Sokichi. 1965b. “Loyal Family in Japan.”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23*: 338-355.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5c。〈必然・偶然・自由〉。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卷》：3 - 123。東京：岩波書店。
(Tsuda, Sokichi. 1965c. “Necessity, Acciden and Freedom.”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20*: 3-123.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5d。〈皇室に関する思想について〉。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三卷》：242 - 266。東京：岩波書店。(Tsuda, Sokichi. 1965d. “The Thought on Loyal Family.”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23*: 242-266.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5e。〈教育に関する勅語について〉。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一卷》：232 - 241。東京：岩波書店。(Tsuda, Sokichi. 1965e. “On the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ion.”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21*: 232-241. Tokyo: Iwanami Shoten.)

津田左右吉。1966。〈ニホン人の知性のはたらき〉。津田左右吉全集編集室編《津田左右吉全集 第二十八卷》：133 - 154。東京：岩波書店。（Tsuda, Sokichi. 1966. “The Work of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okichi Tsuda Volume 28*: 133-154. Tokyo: Iwanami Shoten.)

美濃部達吉。1912。《憲法講話》。東京：有斐閣書房。（Minobe, Tatsukichi. 1912. *A Lecture on Constitution*. Tokyo: Yuhikaku Publishing Company.)

原田熊雄。1952。《西園寺公と政局 第七卷》。東京：岩波書店。（Harada, Kumao. 1952. *Duke Saionji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Volume 7*. Tokyo: Iwanami Shoten.)

奥武則。2018。《増補 論壇の戦後史》。東京：平凡社。（Oku, Takenori. 2018. *A Postwar History of General Opinion Magazines*. Tokyo: Heibonsha.)

萩原隆。2014a。〈日本における伝統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は可能か——丸山真男と津田左右吉——（上）〉。《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篇）》50, 2: 77 - 88。（Hagiwara, Takashi. 2014a. “The Po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in Japan: Masao Maruyama and Soukichi Tsuda (1).” *Journal of Nagoya Gakui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50, 2: 77-88.)

- 萩原隆。2014b。〈日本における伝統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は可能か——丸山真男と津田左右吉——（下）〉。《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人文・自然科学篇）》51，1：13－29。（Hagiwara, Takashi. 2014b. “The Possibility of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in Japan: Masao Maruyama and Soukichi Tsuda (2).” *Journal of Nagoya Gakui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51, 1: 13-29.）
- 徳田球一等。1945。〈人民に訴ふ〉。《赤旗》1：1－3。（Tokuda, Kyuichi. 1945. “Appeal to the People.” *Akahata* 1: 1-3.）
- 徳田球一。1946。《天皇制の打倒：人民共和政府の樹立》。東京：文苑社。（Tokuda, Kyuichi. 1946. *Down With Tenno System*. Tokyo: Bunensha.）
- 藤田尚徳。2015。《侍従長の回想》。東京：講談社。（Fujita, Hisanori. 2015. *Reminiscences of a Grand Chamberlain to the Emperor*. Tokyo: Kodansha.）
- 藤岡淳吉編。1951。《日本共産党テーゼ》。東京：世紀書房。（Fujioka, Junkichi. ed. 1951. *The Platform of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Tokyo: Century Bookstore.）
- 大野達司、森元拓、吉永圭。2019。謝煜偉、陳宛妤、陳明楷、林琬珊、魏培軒譯。《近代日本法思想史入門》。台北：商周出版。（Ohno, Tatsuji, Taku Morimoto and Kei Yoshinaga. 2019. Yu-wei Hsieh, Wan-yu Chen, Ming-kai Chen, Wan-shan Lin and Pei-hsuan Wei. trans. *Introduction to a History of Modern Legal Thoughts*. Taipei: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 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2015。黃煜文譯。《服從權威：有多

- 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台北：經濟新潮社。（Milgram, Stanley. 2015. Yu-wen Huang. Trans.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Taipei: Eco Trend Publications.）
- 伊藤博文。2011。牛仲君譯。《日本帝國憲法義解》。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Ito, Hirobumi. 2011. Zhong-jun Niu. trans. *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 安丸良夫。2010。劉金才等譯。《近代天皇觀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asumaru, Yoshio. 2010. Jin-cai Liu. etc. trans.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Image of the Tenn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安井伸介。2017。〈婚姻家庭，自由之蠱賊也——中國無政府主義家庭革命論的意含〉。《政治科學論叢》74：77－110。（Yasui, Shinsuke. 2017.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the Enemies of Liberty: Implications of the Idea of Family Revolution from Chinese Anarch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4: 77-110.）
- 黃自進。2012。《蔣介石與日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Huang, Tzu-chin. 2012. *Chiang Kai-shek and Japan*.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2017。陳宇飛譯。《麥克阿瑟回憶錄》。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MacArthur, Douglas. 2017. Yu-fei Chen. trans. *Reminiscences*. Shangha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 Press.）
- 鶴見俊輔。2008。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台北：行人出版社。（Tsurumi, Shunsuke. 2008. Chen-jui Chiu.

tran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artime Japan, 1931-1945*.
Taipei: Editions du Flaneur)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Debate Over Tenno in Post-war Japan: On the Arguments of Tenno's War Responsibility by Masao Maruyama and Sokichi Tsuda

Shinsuke Yasui *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as adopted as the political system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Tenno (the emperor of Japan), who had not taken actual political power before, became the sovereign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prohibited people from criticizing Tenno in order to maintain his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defeat of Japan in World War II broke this taboo, resulting in a boom of academic arguments about Tenno'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nno and modern Japan, the essence of Tenno, etc. Masao Maruyama and Sokichi Tsuda presented papers about Tenno soon after the end of WWII, but their statements provided a striking contrast: Maruyama insisted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Tenno system as well as the abdication of Hirohito. On the contrary, Tsuda insisted that Tenno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an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enno would no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When they debated over the war responsibility of Tenno, both analyzed the essence of Tenno, which have formed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models of Tenno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 This essay aims to analyze the arguments of Tenno's war responsibility by Maruyama and Tsuda with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constitution (legal liability), Kokutai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 structure) and degeneration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These analyses provide important viewpoints for appreciating Tenno theory.

Keywords: Hirohito, the Meiji Constitution, the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 Kokutai, authority